

转型与增长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现代经济学工作室

张军主编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文献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方法研究

Methodology Research

上海远东出版社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转型与增长

现代经济学工作室

张 军主编

上海远东出版社

【现代经济学工作室】

转型与增长

主 编/ 张 军

责任编辑/ 罗淑锦

装帧设计/ 零语设计

版式设计/ 李如琬

责任制作/ 晏恒全

责任校对/ 周国信

出 版/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 南京展望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

装 订/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0×960 1/16

字 数/ 298 千字

印 张/ 18.75

印 数/ 1—3 100

ISBN 7-80661-541-5

F·87 定价: 25.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与增长/张军主编.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

ISBN 7-80661-541-5

I. 转... II. 张... III. 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中国②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3130 号

序 言

张 军

复旦大学校园西侧的 800 号楼,是一座解放初期建造的两层砖瓦结构的老房子。因为矮小并且侧临复旦大学的西墙,所以人们通常是找不到这座建筑的。现在这幢房子是经济学院的临时办公地址。挂在底楼入口处有不少标牌,表明这里同时是一些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办公室或研究室所在地。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或“环境与资源经济研究中心”等等。

当然,没有人可以在这里找到“现代经济学工作室”的招牌。我们没有任何标志。我们其实只是一种努力、一种向往或者执着追求的欲望与想像力而已。我希望读者不要太在意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经济学工作室的含义。我们很随意,也不介意什么,我们只是想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做事情。于是,我们没有成立什么中心,但是我们希望以“我们”的名义不断推出我们的经济研究的作品。我们常常在任何可以坐下来的地方谋划着我们的想法。我也经常是用电子邮件与我的年轻的同事们来落实着我们的计划。我们在“体制内”已有终身(至少目前可以这么说)的教职,但我們希望在学术研究这个园地内获得“体制外的增长”。

我这里说的“我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它更像是一种氛围。在这个氛围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经济学。我们的口号是“共享学术自由、关注中国问题”。其实,不光是经济研究活动本身,最重要的是,当我或者我们当中的其他人有一些好的想法,想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很快就能做成。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这本凝聚我们思想和智慧的书,今后会有更多的我们的研究成果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因为这样,我经常觉得自己总还是幸运的。因为在我的周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这个临时建筑里,我们总是有一些年轻和比我更年

轻的经济学人站在那里谈论着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课题，刻苦地磨练着经济学的语言和技术。我们不太满足于、甚至也不十分介意我们的职称、薪水和名声，我们是因为崇尚经济学的精神而愿意为之而努力的。毫无疑问，曾经是我们的老师、现在是我们自己造就了这个氛围，而这个氛围造就了我们年轻的和更年轻的复旦的经济学人。我们一起塑造着出自复旦大学经济学人的研究风格和研究能力。

不管我们各自的“编制”隶属于什么“单位”，我们这些人所做的工作是最接近的。我们认为我们都在从事现代经济学范畴里的工作。目前，这个工作在学科上还被笼统地称之为“西方经济学”这个越来越尴尬的名字。在中国，就社会科学来说，一个学科的命名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以及政府部门所能理解与认识的程度。例如，以经济学领域，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的金融学相比，“西方经济学”就始终得不到正确和公平地理解。但我们并不介意这些学科的叫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看到的只是一种含义上的经济学，而我们大家研究和谈论的也不再是另类的经济学。不然的话，我们这一代也就不会有像今天这样的压力和历史的使命，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可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

两年多以前，复旦大学制定了学科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典型的项目资助的计划。在这个学科建设的项目下，每个学科可以申请学校的资助以实现所设计的目标。与学校重点支持和资助的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学科相比，西方经济学只是作为“特色学科”列入资助计划的。三年里，我们将获得 20 万元的学科建设经费。而我是这个学科建设的负责人。在“西方经济学”的学科下，目前在职的均为中青年的学者。其中一位被派往澳门任澳门大学副校长去了，其他的几位年龄都在 45 岁之下。但在我们周围，还有几位 30 岁不到的青年经济学博士和硕士。我们不仅有着学术上相同的偏好，而且许多的想法往往也惊人地相似。与以往常规的做法不同，在“西方经济学”学科的资助下，我开始考虑用这些钱去做一些纯粹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想法立刻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甚至没有宣布什么组织结构，但我们却认真地落实着我们的想法。

首先，我们把本科生经济学基础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和经济思想史）标准化并作为我们这个学科所推出的代表性

(品牌)课程。所谓标准化就是由固定的教学内容、教学大纲、教学参考书和教师。其次,我们想借助由我出任主编的院刊《世界经济文汇》(双月刊,1957年创刊)的改版机会在学生们当中积极倡导和推广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论文的写作方法(顺便说一句,我们正在积极努力将《世界经济文汇》改造成一流的经济学中文杂志)。最后,我就想寻找以某种我们喜爱的方式集中展示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机会。这个想法开始的时候是很朦胧的,并不完全清楚我所希望的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事实上,因为我们有许多方法和途径可以出版或发表我们的研究论文,而且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可是,也许出于我们都怀有的“复旦情结”,我们觉得过去那样的习惯作法肯定低估了我们研究工作的“增加值”。

决定出版我们现在这种方式的作品系列,不仅对于出版社,也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一个尝试和挑战。它看上去是书,更像专业的杂志。但它比书大气和潇洒,充满着多种创意和新思维。它又比专业的杂志可亲可爱,带有少许的浪漫和真情。从书里,我们在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对经济学精神的追求,从杂志里,我们在建立我们与读者之间的零距离对话和友谊。这本作品有意识地给读者留出了可以对话的设计空间。我们自己甚至把这个“作品系列”理解为我们正在开发的“学科建设项目”的产品。既是新开发的项目,就不能没有一定的风险——我们要经受来自读者和市场的检验。

坦率地说,现在这本介于杂志与书之间的东西,是我们慢慢才搞清楚的一个概念。这得益于上海远东出版社的两位女士和我们之间多次的对话与沟通。相互碰撞的想像力使得我们一开始那个比较模糊的想法逐步演变成了现在这个新奇的出版概念。去年深秋的一天,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教授的著作《比较制度分析》的中国版在上海首发,青木教授专程来上海参加活动并在复旦大学做了公开演讲。陪同青木先生来复旦大学的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匡志宏女士和《比较制度分析》的责任编辑罗淑锦小姐。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已经发现她们是很有想法也是很愿意听取他人想法的出版人,这是难能可贵的。于是,当我有了一个关于出版我们的研究系列作品的模糊想法之后,我首先想到了她们俩。随之,我便冒昧给匡女士打了电话。就这样,一项大胆的实验在我们与她们之间的多次面对面的讨论

与策划中被不断具体化和形象化了。

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我们也开始定义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工作。我们到最后甚至觉得必须为自己找出一个“口号”才更过瘾，因为我们需要鼓励和鞭策自己。我们定义着自己的过程不是为了将我们自己与别人区别开来，相反，是想把我们长期以来的努力更好地纳入到那些促进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当中去。我们所展示的不是所谓的“海派经济学”，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经济学的“海派”。但我们期望，就像往常一样，海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在上海这个地方能找到可以交流和对话、但又不那么浮躁的年轻的同行。

按照我们的设想，这个作品系列在近期将以集中展示我们自己的经济研究作品为主，但我们也会在适当的时机逐步地将它营造成一个开放的平台，海纳百川，共同笼络中国青年经济学家的智慧和能力，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我们的努力。在作品系列的结构上，我们在每一辑将有意识地选择一些重要的研究论文来共同研讨和突出一个主题，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并提高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等重大问题的认识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仍将在每一辑几乎固定地编入“文献综述”和“读书评论”等栏目以保持它的动态特征。

为了更长远的发展，我们的这个尝试需要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同行的支持，更需要读者的支持。有了读者和国内外同行的支持，我们将有能力充分利用这个作品系列的出版并与上海远东出版社一起创造更多的条件来吸纳更多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参与到推动这个“系列”发展的努力中来。以这个系列的作品为平台，我们还可以举办公开演讲、书评会以及大型研讨会等活动，积极在上海这个商业化的大都市里营造浓厚的学术研究的氛围。

最后，我要感谢许多人对我们的支持。复旦大学学科建设领导小组为“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建设项目给予的资助使我们能够开展这些项目的工作并为这些延伸的产品提供了基础。我很高兴地得知，学科建设小组聘请的专家组以及叶绍梁先生对我们已有的工作给予了首肯。我还要衷心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匡志宏女士和编辑罗淑锦小姐，她们对出版这个作品系列所付出的努力已经超越了出版人的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与我们一样，实际上也是这个系列的策划人

和设计者。我还要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这里不仅是我们工作的地方,而且它提供的相当宽松和自由的学术空间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持久的影响。陆德明教授、华民教授、姜波克教授、张晖明教授、石磊教授等以及老一代的蒋学模教授、洪文达教授、张董华教授、伍柏麟教授、洪远朋教授、尹伯成教授等长期以来对我们“西方经济学”学科建设给予了诸多的支持和方便,我深表谢忱。

当然,我也要感谢我身边的那些非常年轻的同事们,陈钊、陆铭、冯曲等,没有他们的热心、理解、投入和对学术的执着的追求,我的很多想法是难以落实的。在这个“系列”里面,尤其包含了陆铭和陈钊的许多重要的建议与想法。

2002年7月12日写于
哈佛大学商学院 Soldiers Field Park 宿舍

现代经济学工作室简介

“现代经济学工作室”是由张军教授倡导发起的、在复旦大学校园内活动着的一个开放式的年轻的工作团队。该团队坚持“共享学术自由、关注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方面倡导并坚持学术的规范化和国际化，愿为中国经济学的转型和现代化而孜孜努力。

目 录

学 术 研 究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	张 军	3
所有制、厂商规模与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率的决定： 解释及其政策含义	张 军	28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袁志刚	59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分析框架	张 军 冯 曲	78
作为合作博弈的企业转制：以江阴为例	陈 钊 陆 铭	96
习俗的本质与生发机制探源	韦 森	108

文 献 综 述

惯例的经济分析 ——演进博弈论制序分析的新进展	韦 森	147
转型国家的经济重构和所有制结构调整： 文献与评论	陈 钊	181
中国乡村工业研究的一个评述	冯 曲	204

方法研究

经济学的理性基础研究和进化博弈论	谢识予	233
议价理论及工资与就业的决定	陆 铭	249
走近经济研究	张 军	278

现代经济学工作室

A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转
型
与
增
长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转轨特征*

张 军

张军,1963年生于安徽,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1992),现为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经济学院副院长(2000—2003),兼任复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筹)主任和上海市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世界经济文汇》杂志主编。曾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并曾在哈佛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丹麦东亚研究所、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部、日本青山学院、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日本上智大学(Sophia)、英国伦敦大学 SOAS 学院等做访问教授。曾获“霍英东研究奖”(1998)和“蒋学模经济研究奖”(2002)等。

出版专著《现代产权经济学》、《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等,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经济学季刊》、*East Asian Review* 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主要研究领域：转型经济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产权经济学和制度变迁理论，产业组织经济学和中国的工业经济研究。

联系方式：021 - 65642724, 65647719 (传真);
junzh_2000@yahoo.com

个人主页：<http://go8.163.com/prozhang>

* 本文是在先前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写成的。对于那些研究所获得的资助，作者表示感谢。文章的初稿曾经得到许多同行的评论和修改建议，并于最近在浙江大学的“经济转轨与制度变迁”的国际会议上宣读。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施少华、章元和郭为在本研究的初期和后期担当了助理，作者一并表示谢意。但文章中存在的错误和缺陷由本文作者负责。



一、引言

众所周知,1978 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在没有完整的改革方案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本身就构成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正统的“转型教义”里,增长是彻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产物。不过,虽然正统的转轨政策强调“一步到位”的改革计划,但俄罗斯和东欧的转轨经验已经说明,它们的转型经济在这种方案下所经历的却是长时间的衰退而不是增长。正因为如此,早期对经济转轨的研究多集中于转轨的比较学。这类的文献试图说明的更多的还是中国的转轨政策为什么避免了像俄罗斯和东欧那样的经济衰退。在这些比较研究中,中国经济转轨的“增量”特征对于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意义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例如,盛洪主编,1995)。但是,由于这个所谓的“增量”主要表现在新兴工业化部门(特别是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因此,对于中国的渐进主义的转轨政

策究竟以什么可辨认的方式以及在多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增长,在经济学家内部便存在着解释上的分歧。这个分歧基本上是,乡镇企业部门的扩张在中国究竟应该理解为一种典型的发展过程还是应该解释为一种制度创新的努力?^①

毫无疑问,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所实行的以鼓励新兴部门横向进入(所谓“计划外的”自由化)为特征的改革计划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具有头等重要的含义。不过,我们认为,理解上述分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在改革后的持续经济增长是否已经显示出显著的“工业化”特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显然不应该再像很多研究那样仅仅考察乡镇企业部门,相反,我们需要研究经济的增长学本身。因为在增长经济学的框架里,增长过程中是不是表现出“资本深化”的趋势将是反映“工业化”特征的重要信息。

在本文,我们构造和依赖的基本理论是,对于一个以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为特征的计划经济而言,“增量改革”或鼓励新兴工业部门的横向进入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改善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效率。因此,在逻辑上,中国在改革后的高速增长似乎就应该主要由资源在部门间的再配置所产生的静态收益增量来解释。可是,根据一般均衡的原理可以推知,静态配置效率的改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趋于下降。例如,农产品计划价格的自由化在其初期虽然将大大提高产出水平,但是随着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并轨”,产出的增长将递减^②。以此而论,资源从低收益率部门向高收益率部门的转移所推动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可能是“一次性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缺乏持续的和动态的改进机制(通常可以由“动态效率”的度量指标 TFP 的估计来检验),那么,资本的迅速而持续的积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源泉,而这个过程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工业化”。

① 例如,威兹曼和许成钢(Weitzman and Xu, 1994)就典型地在制度创新的意义上解释乡镇企业的扩张。

② 感谢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的哈勒根(W. Hallagan)博士在与我讨论时提到的这个论点。